

向建党70周年献礼!

历史的规律 胜利的道路

——中国革命史若干问题研究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序 言

今年是鸦片战争150周年。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在帝国主义铁蹄下所遭受的耻辱和灾难；永远不会忘记，千千万万爱国志士、革命先驱为国为民奋斗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光辉业绩；永远不会忘记，“落后必定挨打”这个惨痛的教训。一部中国近代史证明，中华民族之所以能站立起来，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这就是历史的结论。为了使广大青年学生了解近代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历史及其发展规律，认清国情，明确自己肩负的重大历史责任，从而自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实现四化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基于上述认识，我省高校自1985年以来，将《中共党史》改为《中国革命史》，是受学生欢迎的。为了把这一门课程的改革进一步深化，我局于去年秋组织了一批长期工作在教学第一线、既有丰富经验，又有较高理论水平的同志撰写了《历史的规律，胜利的道路》中国革命史若干问题研究。这些专题从选题、定大纲到撰写的内容都进行了集体讨论和多次修改，前后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大家付出了大量的劳动，谨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本书的出版无疑地对我省高校政治理论课的改革，提高

教师的业务水平，将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本书的指导思想明确。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作为贯穿全书的红线。选题体现了理论、历史和现实的结合，抓住了《中国革命史》中，重大的关键性问题。文章力求做到求实创新，观点鲜明，材料典型，文字精炼。更为可贵的是，作者力图在总结历史经验，探索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结合教学中的主要问题，特别是在当前的青年学生思想中存在的较深层次的认识问题，能从理论上给予科学的说明，以期达到启明发聩的目的。全书共23篇文章，的确值得政治理论教师、政工人员和广大青年学生认真读一读。

从我个人来看，本书至少有以下两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科学性。作者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以客观存在的事实为依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真地进行分析、归纳、论证，力求做到史与论的统一，历史与现实的统一，基本原理与客观实际的统一。同时，本书的作者还认真吸取近几年来我国史学界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最新研究成果。因此，本书就不仅有“可读”性，而且也具有“可信”性。

第二、战斗性。作者在撰写专题的过程中，贯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努力做到把丰富生动的历史教育，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紧密地联系起来；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联系起来；同反对国际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战略联系起来。并结合去年春夏之交的政治动乱中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种种谬论，进行有力的批判和驳斥，有利于帮助青年学生明辨是非，站稳

立场，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当然，中国革命史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本书在选题上多侧重于政治方面，对于经济、思想、文化、民族、战争、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对外关系等方面的研究课题还有不足之处，还有待于大家作进一步的努力。我希望不仅从事革命史教学的同志要继续开展这方面的研究，而且从事《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等门课程教学的同志，也把专题性研究开展起来。如果这样，我省高等学校的政治理论课教学和研究工作，就一定会更上一层楼。是为序。

周 鹤 鸣

1990年8月

目 录

序 言	周鹤鸣 (1)
论帝国主义侵略是中国近代社会贫穷落后的 重要根源	叶洪添 巫永福 (1)
论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	李慰祖 (28)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中国社会历史 发展的必然	丘沐平 罗任权 (52)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马菊英 王录斌 (73)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甄 欣 (103)
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	杨日隆 (126)
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战争的胜利	黄飘云 (148)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中国革命胜利的 锐利武器	罗世钦 (173)
中国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曾锡鹏 (200)
失民心者失天下 ——南京国民党政权迅速崩溃的主要原因	陈流章 (233)
从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看帝国主义的 侵略本质	关福汉 (257)
中国为什么不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戴美瑛 (286)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再认识	叶洪添 张健富 (309)
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和发展中国	司徒超 张世越 (340)
“文化大革命”后的思考	徐宝琪 (362)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历史的伟大转折.....	梁广基(381)
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谭石洲(405)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根本的政治制度.....	万先进(438)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	杨世兰(460)
农民问题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问题.....	杨日隆(488)
新时期执政党的建设问题.....	谭 康 朱惠中(502)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坚持	
党的领导.....	黎 新(527)
新时期必须继续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宋天铨(550)
编后话.....	(579)

论帝国主义侵略是中国近代社会贫穷落后的重要根源

叶洪添 巫永福

在中国的近代，帝国主义疯狂侵略我国的百年间，给中华民族带来沉重的灾难，使中国人民陷入苦难的深渊，这是任何人也否认不了的历史事实。然而，近几年来，特别是1989年春夏动乱期间，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煽动下，“帝国主义侵略有功论”甚嚣尘上。人们似乎看到凶恶的帝国主义竟成了慈祥的圣诞老人。什么“要以蓝色文化取代黄色文化”，“要全盘西化”，“中国要搞三百年殖民地。”^①这确实是迷惑和欺骗了一些不懂历史或对历史知之甚少的人们。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究竟是有罪还是有功？帝国主义到底是中华民族的敌人还是恩人？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不是主要矛盾？一百多年来的中国近代史还要不要重写？总之，这涉及到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究竟是促进我国经济繁荣、社会进步还是使中国贫穷落后？本文试图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系统地探讨这个十分严肃的问题。

一、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使中国陷 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狱

是谁把独立、完整的中国搞得四分五裂、遍体鳞伤？是谁把一个美丽、富庶的中国弄成贫困落后的境地？又是谁严重阻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把中国的社会一手推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狱？不是别的，正是穷凶极恶的外国帝国主义和腐败无能的本国封建主义。

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两大敌人中，最主要的是帝国主义对中国最野蛮的侵略和最疯狂的掠夺，它成为中国近代社会矛盾中的最主要矛盾。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二者互相勾结以压迫中国人民，而以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为最大的压迫，因而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②在帝国主义侵华的一百余年的历史中，对中国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侵略战争，强迫中国的政府签订了一个又一个的不平等条约，这是束缚中国社会进步的沉重枷锁，是外国侵略者侵略中国的血腥记录！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中国社会形态，是在外国帝国主义控制下，在政治上经济上失去独立，封建经济逐步瓦解而资本主义因素已得到一定发展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它们在这百余年时间里，在中国肆意倾销商品，发动战争，割让土地，残杀人民，劫掠财富，传播宗教，派遣特务，收集情报，残酷地进行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侵略，把独立的中国封建社会

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一) 瓜分中国领土

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破坏了我国领土完整，主权被强夺。首先是英、美和沙俄，后来加上日、德诸国家。此外还有奥、意甚至一些很小国家如比利时、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也都曾蜂涌而来。它们强迫中国政府先后签订了千余个不平等条约。其中与腐朽的清政府签订的就有500多个（英国120个、俄国92个、日本75个、法国59个、德国43个、美国23个、比利时15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了我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这个条约正象马克思指出的：“是在炮口的威逼下订立的。”^③ 条约规定割让香港给英国。第二次鸦片战争通过《北京条约》又割让九龙半岛南端，后又租借深圳河以南230多个岛屿。接着葡萄牙于1887年通过签约，强占澳门。沙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及以后，又逼签《璦琿条约》、《北京条约》和一系列勘界议定书，先后割占了我国东北、西北大片领土，使我国丧失领土150多万平方公里，成为外国侵略者霸占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恩格斯指出，沙俄“除了分沾英法所得的一切明显的利益以外，还得到了黑龙江沿岸地区”，它“从中国夺取了一大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④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向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过渡的阶段。资本主义列强加紧掀起掠夺殖民地，而地域辽阔国力衰弱的中国就成为列强争夺的主要目标。70至80年代，中国的东南、西南和西北边疆几乎同时发

生外国侵略的危机。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占领了我国台湾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霸占台湾岛达50年之久。此外，威海卫、旅顺、大连、胶州湾、九龙半岛、广州湾等地也都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租借地。日本军国主义自明治维新之后，把中国作为他们侵略的主要目标。1915年提出了灭亡中国的“21条”，幸得中国人民强烈反对才未被实现。1931年日帝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东北三省，并统治长达14年之久。1935年搞华北五省自治，使华北丧失了独立地位。1937年“七七”事变后至日本投降前的八年时间里占领了我们大部分领土。日本投降后，美帝国主义接踵而来，扶持蒋介石反动政权，企图使中国成为其独占殖民地。我国大陆解放后，它又派遣第七舰队，霸占台湾。并发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侵朝战争，妄图卷土重来，灭亡中国。

列强在强占我国土地的同时，为了掠夺更多的经济利益，取得更多的政治特权，在19世纪末期，他们在我国掀起了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德国以干涉日本还辽（即指归还辽东半岛）“有功”为由划山东为其势力范围；法国强行划云南、广西及广东大部分地区为其势力范围；英国把长江流域沦为其势力范围；日本强令福建为其势力范围。美国因与西班牙战争结束后，列强在中国势力范围已划分完毕，于1899年提出“门户开放”政策，是企图通过“机会均等”手段，以保护中国市场对美国商品的自由开放。

帝国主义列强除了在我国占领土地、划分势力范围外，他们还不断地在中国增设通商口岸。而每个通商口岸正似一个抽血的针孔，它们从这里贪婪地吸吮着中国人民的血汗。

在这方面《南京条约》开了先例，规定五口通商。这使得我国东南沿海门户大开，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步步侵入创造了条件。到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时，通商口岸就增至19处，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时增至35处。在辛亥革命以前，帝国主义强迫中国开商埠70余处，到1930年10月，竟达150处之多。他们就是通过这些商埠，榨取了我国大量的财富和资源。不但如此，他们还在这些城市里索取土地，设立租界。据统计，至1909年帝国主义在中国设租界已达40多处，占土地竟达88000多亩。在北洋军阀及国民党南京政府统治时期，设置的租界有增无减，有的如上海汉口等大城市里，都有好几个列强设立租界。在租界里，他们实行了一套完全独立于中国之外的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他们设立法院、监狱、市政管理机关及税收机关在租界内为非作歹，中国政府与人民不允许问津，成为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在上海的公园门前，公然挂起“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实际上租界成了他们走私偷运贩卖毒品、搜集情报、操纵我国金融财政、掠夺原料及劳动力、培植买办势力的基地，也是他们对我国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侵略的堡垒。

（二）强夺中国主权

一个国家享有主权，是国家独立的重要标志。然而，我国的主权，不断地受到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野蛮践踏和肆意侵犯。他们一步步地搜取了我国各个方面的权益。从《南京条约》及其补充的《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约》夺得“领事裁判权”、“关税协定权”、“沿海贸易权”、“居住租地权”开始，接着通过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又相继夺取了

“内河航行权”、“铁道修筑权”、“矿山开采权”等等。这样，他们可以不受中国法律的任何制约，在中国的陆地、领空、领海，为所欲为，疯狂地侵略我国的主权。在这方面的事例是很多的，例如：

1. 直接干涉中国的内政外交。1859年，清政府在上海设立总税务司署，按照英国的建议，任命英人李泰国为首任总税务司。1863年，英人赫德继任总税务司直至1909年。他们两人先后担任海关总税务司竟达52年之久。他们不但在经济上掌握了清政府的命脉，而且直接干涉中国的内政外交，还为英国的政治、经济侵略集收情报。英国侵略分子承认：“一切必要的消息都可以从海关那里得到”。⑤

他们直接干涉中国的内政外交还表现在外国侵略者可代表中国政府出国访问及签订条约。根据《天津条约》，列强得以在北京派驻使节。1867年，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卸任。次年，经他自荐，清政府授其“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头衔，率领“中国外交使团”出访欧美各国。代表团的左、右“协理”则是英国使馆的柏卓安和法国人德善（海关职员）充任，中国海关官员道志刚、礼部郎中孙家谷只是随员而已。使团到美国后，蒲安臣不经请示，擅自代表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了《中美续增条约》，使美国掠夺华工及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设立学堂合法化。

2. 直接干涉中国的军事权和行政权。如英国人李泰国曾擅自任命英国海军军官阿思本为中国舰队的舰队司令，他还“代表”清政府与阿思本签订合同，其中规定阿思本对中国舰队“有完全指挥权”；“阿思本将任命海军船只上的一切官兵，由李泰国作为皇帝之代表予以批准”。英人赫德并公

然向清政府提出，要任命张凯嵩为云贵总督、吴棠为四川总督。

3. 直接禁止中国人民建立反帝的组织活动。在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中规定：“永禁或设或入与诸国仇敌之会，违者皆斩”。“各复督抚、文武大臣……，均有保平安之责，如复滋伤害诸国人民之事，或再有违约之行，必须立时弹压惩办，否则该管之员，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就是说，清政府应惩办在义和团运动中与帝国主义作对的官吏；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加入反帝性质的各种组织，违者一律处死，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

4. 直接干涉中国政府行政机构设置。《辛丑条约》竟规定：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使“外务部”直接成为替帝国主义服务的行政机构并且把它放在中央部级机构的首要位置。

（三）掠夺中国经济

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对外扩张、侵略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进行经济掠夺，攫取更多利润，他们的手段是毒辣、凶残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

一是勒索大宗的战争赔款。帝国主义侵华百余年的历史，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了那么多的条约，赔款的数额是十分惊人的。仅1842年、1860年、1895年及1901年四次战争的赔款总计达白银7亿1千余万两。其中1894年甲午战争对日本的赔款竟达2亿3千万两，但当时政府的财政年收入只7千多万两，赔款数就达财政收入的3倍。就以日本当时1亿人口计算，则平均每人可获得白银2两3钱。1901年《辛丑

条约》的签订，清政府向各国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加上年息4厘，分39年还清，本息共9亿8千多万两，总数超过10亿两。当时中国人口以4亿计，则平均每人要负担2两半以上的白银才能把这笔赔款还清。以上所说的只是几次战争的赔款数，而每次战争后的赎城费、抚恤费、犒军费等等，还未计算在内。据统计，帝国主义列强掠夺和侵略中国一百多年间，赔款折合白银达13亿两。仅赔款一项他们就攫取如此巨额银元，中国岂不贫困、落后？！

二是向中国进行商品输出。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这50余年间，世界资本主义各国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是以商品输出为主。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开始寻求新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开拓新的殖民地，列宁指出：“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漩涡之中，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①为此，资本主义靠征服、劫掠、杀戮，获得大量的金银财富。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一直是个出超国，直至19世纪30年代，英商对华的贸易逆差仍然达2、3百万两以上。1813年，他们发现鸦片这种特殊商品最有利可图，一箱上等的鸦片成本费237个卢比，但拍卖价高达2428卢比，超过成本费的9倍。鸦片在中国的大量倾销，使中国贸易由出超国变为入超国。至1838—1839年，输入鸦片达35500箱。从19世纪30年代起，英国输入中国货物的总值中，鸦片已占到50%以上。英国通过鸦片每年从中国掠走的银元达数百万元。据统计，从1843年至1846年的三年间，中国输出的白银达3500万元。结果中国出现银荒，财政枯竭，而英国则取得巨大利润，仅鸦片税一项占英属印度政府全年收入的1/7，

到了50年代则占1/6。除鸦片贸易之外，据《海关华洋贸易册》记载，洋货进口1864年值5100余万两，到1894年值增至1亿6千2百余万两，30年间洋货进口增加了3倍多。它们的商品深入内地，严重地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三是向中国进行资本输出。19世纪末，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后阶段，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对外以资本输出为主。甲午战争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大量向中国输出资本。它们都在我国设立银行，作为对中国输出资本的总机关。1845年，英国东方银行在广州设分行，这是外国在中国开设的第一家银行。此后，英、法、日、德、美先后设立银行。这些银行在中国经营国际汇兑，发行纸币，对清政府贷款，操纵中国金融市场，成了列强控制中国财政经济命脉的工具。仅英国汇丰银行1901年至1939年帐面纯益就达36759万港元。它们对中国进行了大量的企业投资，谋取暴利，仅企业盈余一年可达2亿元。据统计，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贷款自1865年至1948年，总额达30.1950亿美元。贷款利息（含回扣、经理费）高达60.6%，其获得的巨利是惊人的。它们就是通过对铁路、开矿等项贷款或投资，掠夺了筑铁路和开矿的权利，还进一步攫取路、矿附近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权利。

四是大量走私，以偷税漏税的方式劫取中国财富。据英国领事雷顿的估计，“1846年厦门走私的货物占全年贸易额的13%。”“1844年至1848年，广州进出口贸易量并没有显著变化，但海关收入的数字却大大缩小了，1844年海关收入3360,832银元，到1848年海关收入仅1424,045银元了，后者为前者的42%，即四年间，海关收入损失了一大半。”②

五是公开进行抢劫。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后，焚

掠了举世闻名的圆明园。英法联军疯狂地抢劫了三天，将宝物抢走，拿不走的就加以毁坏。为了发泄仇恨和消灭罪证，在离开时纵火焚烧了营建150余年的堪称“万园之园”的圆明园。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天”。^①他们洗劫了堆满金银翡翠和历朝宝物的皇宫、颐和园、三海，抢劫官衙库款。“各处库款，所失约计六千万两”。^②日本占领东北，抢劫规模更大，仅1944年一年，从东北劫往日本的粮食达800万吨，占当年东北粮食总产量的45%。日本占领台湾，仅从1925年到1943年的19年中，从台湾抢走大米总计达5960万吨，占同期台湾大米总产量的38.8%。

（四）西方腐朽思想文化的渗透和侵略

帝国主义在进行上述的政治、经济侵略之外，对于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的一方面，丝毫也没有放松，这就是它们的思想文化的渗透和侵略。

一是传教。帝国主义分子公开说，传教对于“获得殖民地有大功”，因此，他们披着传教士的外衣，拿着十字架在鸦片战争以前就进入了中国。1844年，法国强迫清政府签订《黄埔条约》，迫使清政府放弃对天主教的禁令。1846年终于获得了在各通商口岸自由传教的权利。1858年《天津条约》中规定外国人可往内地自由传教。此后，传教成了外国侵略势力在中国内地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一个重要手段。从鸦片战争至19世纪末，外国传教士来华达2300多人，建立教会60多个，吸收教徒近80万人。仅山东一地，各种教堂及教会机构在全省有一千余所，传教士教徒8万多

人。外国传教士到处侵夺权益，搜集情报，干涉中国内政，为本国政府出谋献策。正如美国传教士狄考文所说：“基督教的工作目标，……不单在尽量招收个别信徒，乃在征服整个中国”。^⑩庞大的教会势力与列强对中国政治、经济侵略相互配合。玛礼逊、郭士立之类是鸦片烟贩子；裨治文、丁韪良之类是搜集中国情报的间谍；贝福煦为袁世凯奔走，司徒雷登为蒋介石出谋献策。李提摩太、李佳白之类办广学会，外表上是办文化事业，但实质在于麻醉我国人民。在广学会第11届年会上，英国驻上海领事讲演说：“给广学会捐1元钱，等于两军交战之时枪中发出一颗子弹。”李提摩太又解释说：“办广学会的目的，就是消灭中国人民的反帝思想和行动。”^⑪传教是帝国主义进行文化侵略的重要内容，它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激起了中国人民起伏此起、持续不断的反教会斗争。

二是办报纸。这是帝国主义对我国人民进行思想文化侵略的工具之一。近代外国列强在我国境内办报开始于1833年在广州刊行的《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鸦片战争以后，英国等外国侵略者在香港和通商口岸创办报纸。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办报的根本目的，不是为发展中国文化科学，而是为了调查中国情况，搜集情报；传播封建思想与洋奴思想；帮助并指挥中国的反革命阶级去攻击中国人民。例如1861年在上海发刊的《上海新报》（即是《字林西报》的中文版，编辑为伍德、林乐知等），极力为清政府献策以攻击太平天国运动。在1927年初，《字林西报》鼓动蒋介石贩卖革命。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说：“外报——其言论与记载，均与其国之外交方策息息相关，一步一趋，丝毫不乱……彼报代